

## 紙廠印記在清代中文善本古籍版本鑑定之運用

### Edition Verification with the Use of Paper Manufacturers' Marks Stamped in the Rare Chinese Books of the Qing Dynasty

張寶三 Chang Pao-San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pplication,

Fo Guang University

E-mail: pschang@mail.fgu.edu.tw

#### 【摘要 Abstract】

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時見鈐有長方形朱文紙廠印記或長條形包含紅、藍色圖案之紙廠印記。此類印記乃鈐於古籍被印刷或抄寫之前，屬於紙張上之鈐印，與古籍中之藏書印性質有別。筆者曾撰「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鈐紙廠印記研究」一文，刊於《臺大中文學報》第 39 期，對此類紙廠印記之成因、內容、形制及其在版本、造紙史方面之研究價值等嘗作初步探討。惟該文因討論之重點及篇幅所限，極多內容仍未能詳論，故本文擬賡續前文，針對紙廠印記在清代中文善本古籍版本鑑定之運用及其相關問題，舉例加以討論。全文計分以下五節：(一) 前言，(二) 紙廠印記之確定及其出現之時代，(三) 紙廠印記在清代中文善本古籍版本鑑定之運用舉隅，(四) 紙廠印記運用於清代中文善本古籍版本鑑定之限制及省思，(五) 結論。希冀經由本文之論述，能引起學者專家及古籍整理工作者對此類紙廠印記更多重視，並充分加以利用。

In various rare books of the Qing Dynasty, paper manufacturers' marks of rectangular seals with red words or long-shaped ones with red and blue patterns can often be found. Such marks were stamped on the paper before any printing or copying work took place.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book collector's marks in nature. I have written an essay "Paper Manufacturers' Marks Stamped in

the Rare Chinese Books of the Qing Dynasty,” published in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T.U.* 39 (12/2012), to make an initial exploration of the factors, contents, designs of paper manufacturers’ marks and their value to researches of edition verification and papermaking history. However, due to the thesis focus and word limit, there are many other aspects of paper manufacturers’ marks remaining to be examined.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continue the same theme with a focus on the question of how to use paper manufacturers’ marks in the rare Chinese books of the Qing Dynasty to verify text edition. Examples shall be given in order to address this and many other related questions. The following five sections are included: (1) Introduction, (2) The confirmation and appearance of paper manufacturers’ marks, (3) Examples of edition verification with the use of paper manufacturers’ marks in the rare Chinese books of the Qing dynasty, (4) Limit and reflections on the use of paper manufacturers’ marks in edition verification, (5) Conclusion. Hopefully, the discussion in this paper can call for more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paper manufacturers’ marks in the study and classification of rare books.

### 【關鍵詞 Keywords】

清代、善本、紙廠印記、版本鑑定

The Qing Dynasty; Rare Chinese Books; Paper Manufacturer’s marks; Edition Verification

## 一、前言

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時見鈐有長方形朱文紙廠印記或長條形包含紅、藍色圖案之紙廠印記。此類印記乃鈐於古籍被印刷或抄寫之前，屬於紙張上之鈐印，與古籍中之藏書印性質有別。以往學者、專家對此類印記雖嘗有所留意，<sup>1</sup> 然仍鮮作深究。筆

---

<sup>1</sup> 如國家圖書館編印，《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經部》（臺北市：國家圖書館，1996）曾紀錄《周易本義》一書中鈐有「『吳正有號』朱文長印四周飾以花紋。」（頁12）又韓兆海、張穎

者曾撰「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鈐紙廠印記研究」一文，對此類紙廠印記之成因、內容、形制及其在版本、造紙史方面之研究價值等嘗作初步探討，初稿發表於 2012 年 5 月 11 日至 13 日在芝加哥大學舉行之「文本中國：現代中國以前文本資料之構成、傳遞與保存」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其後經修訂，刊登於《臺大中文學報》第 39 期。此文發表後，不意引起一些回響，四方友人常惠賜相關訊息，<sup>2</sup> 又「紅學」專家任曉輝（2013）嘗將此類紙張印記之特徵運用於俄羅斯所藏《紅樓夢》抄本之版本鑑定上。惟「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鈐紙廠印記研究」一文，因討論之重點及篇幅所限，極多內容仍未能詳論，故本文擬賡續前文，針對紙廠印記在清代中文善本古籍版本鑑定之運用及其相關問題，舉若干實例加以討論，以就正於方家。亦期引起專家學者與古籍整理工作者對此類紙廠印記更多重視，並充分加以利用。

## 二、紙廠印記之確定及其出現之時代

有關此類印記確定為紙廠印記及其成因，在「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鈐紙廠印記研究」（以下簡稱前文）中已有詳考，故不復贅論。今為方便下文討論，先將相關內容擇要述之，以作為下文論說之基礎。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有清納蘭成德（1655-1685）輯《通志堂經解》一部，存 136 種，499 冊，清康熙十九年（1680）通志堂刻本。<sup>3</sup> 此書所收宋張載《橫渠易說》卷三，頁 48，b 面，及《古周易》頁 22，b 面，二處均鈐有「張嘉祥號選／料荊川太史」朱文長方印記。（如圖 1）此印記既言「選料」、「荊川太史（紙）」，則其為紙廠

---

主編，《武漢圖書館館藏古籍善本書志（第一輯）》（武漢市：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中曾著錄《左傳經世鈔》一書「卷十二葉三十二、四十三，卷十四葉三十六，卷十六葉九鈐『吳大成號』朱印，是紙號徽記也。」（頁 177）另沈津主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史部》（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亦嘗述及「清抄本《湖北金石詩》」一書「最末一頁蓋有紙鋪木記二方，一方為圓印『河』字，一方為長方印，上端橫書『福建』二字，下端豎書『集義字號，本廠自造選料加重毛太剔破毛錄，馳名紙貨發行』。」（頁 826）對此類紙廠印記皆嘗偶有紀錄。

<sup>2</sup> 如友人繆延豐嘗賜告遼寧省圖書館所藏《嘉興藏》中見有「宗文號本廠／荊川太史紙」朱文長方印及長條形紅、藍色圖案之紙廠印記，惟此本《嘉興藏》之刊印時代待考。

<sup>3</sup> 登錄號：0100555-976，0100978-1054（缺 100977）。

印記無疑。另同書《橫渠易說》書末所附宋呂大臨撰《橫渠先生行狀》頁 6, b 面, 鈐有一長條形印記, 印記左方為含有「張」字上半部之藍色圖案, 右方為含有「嘉」字大部分之紅色圖案。(如圖 2) 又同書所收宋朱元昇撰《三易備遺》卷三, 頁 28, a 面, 見鈐有一長條形印記, 印記右方為含有「張」字下半部之藍色圖案, 左方為含有「祥」字全形白文小方印之紅色圖案。(如圖 3) 此等長條形紅、藍色圖案, 既出現「張」、「嘉」、「祥」等字, 可證當與「張嘉祥號」有關, 亦為紙廠所鈐之印記。再者, 同書所收元李簡撰《學易記》卷九, 頁 5, a 面、元俞琰撰《俞氏易集說》上經, 頁 39, a 面、元詹道傳《孟子集註纂箋》卷六, 頁 19, a 面等處, 皆見長條形含有文字片段之紅、藍色圖案鈐於刻本文字之背面,<sup>4</sup> 由此推之, 此等紙廠印記當鈐於此書印刷之前, 而非書籍印成後所鈐。此種現象亦屢見於他書。<sup>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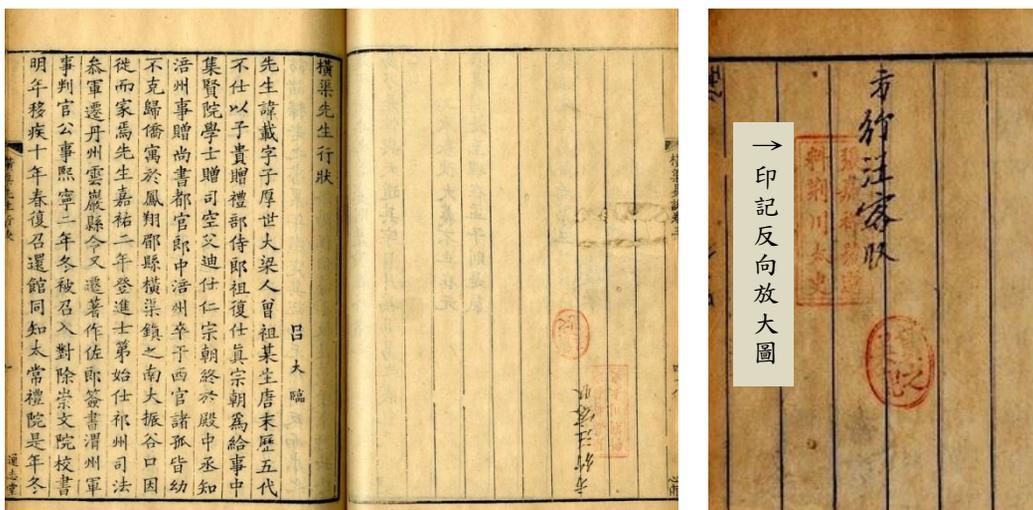


圖 1 張家祥號選／料荊川太史。圖片取自臺灣大學圖書館藏《通志堂經解》。

<sup>4</sup> 此處言「鈐於刻本文字之背面」, 意為刻本印有文字之部分為正面, 其反面為背面。

<sup>5</sup> 如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所藏清姜兆錫 (1666-1745) 撰《九經補註》八十七卷 (索書號: T110 8438) 中, 《周禮輯義》卷 7, 頁 6, a 面, 《儀禮經傳內篇》卷 7, 頁 5, a 面, 卷 8, 頁 32, a 面等處, 亦皆見有長條形紅、藍色圖案之紙廠印記鈐於文字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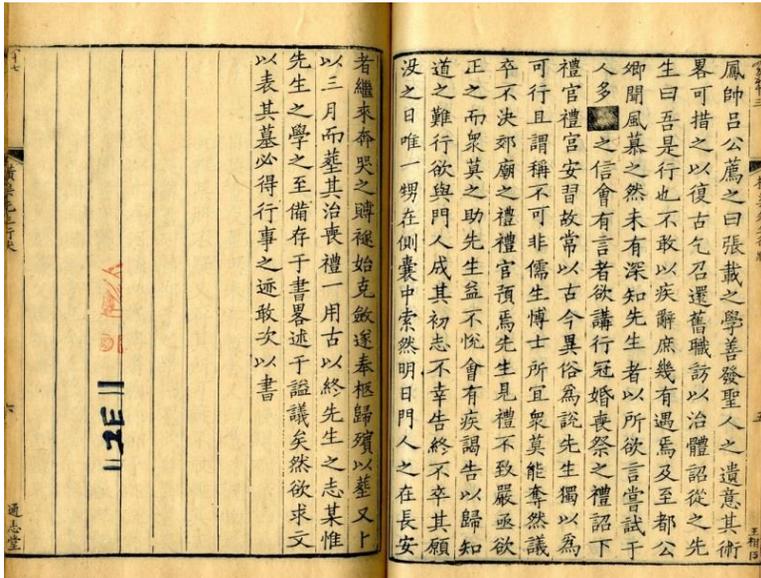


圖 2 長條形夾有「張」字上半及「嘉」字大部分之紅、藍色圖案印記。圖片取自臺灣大學圖書館藏《通志堂經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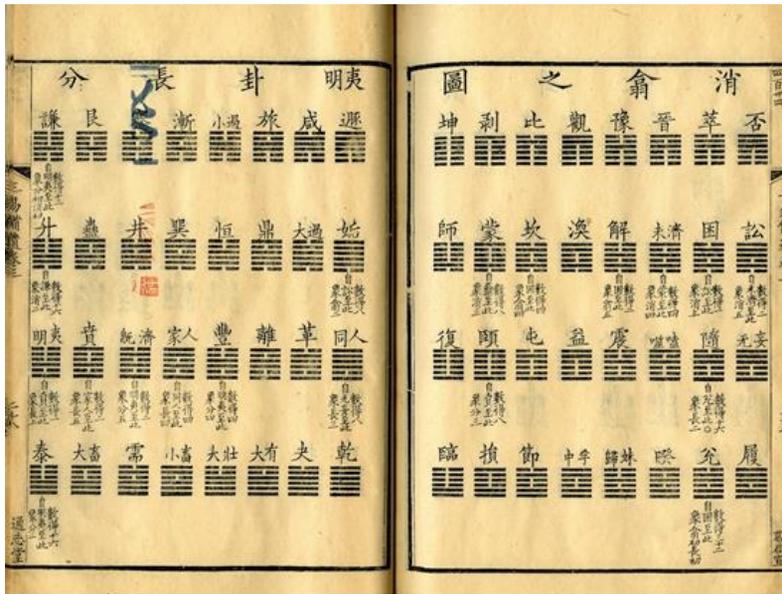


圖 3 長條形含有「張」字下半及「祥」字全形之紅、藍色圖案印記。圖片取自臺灣大學圖書館藏《通志堂經解》。

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此類紙廠印記出現之時間上限，尚難確定，惟據今所見資料考之，可確知清康熙年間已出現此類印記。考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有清初重刻汲古閣刻本《十三經註疏》一部，<sup>6</sup> 其書之書首空白頁中有清馬維駒墨筆識語云：「康熙甲申，先大夫秋湄乾樓收閱。」下署「雍正甲辰男維駒敬識。」<sup>7</sup> 此刻本中出現多處鈐有長條形紅、藍色圖案之紙廠印記，據此推之，馬秋湄於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既已得見此書，則書中紙廠印記所鈐必不晚於此年。此外，尚見有其書扉頁題康熙間鐫，而書中出現有紙廠印記者，<sup>8</sup> 可作為參證。惟另亦有書中出現有此類紙廠印記而館藏書目著錄為明刻本或清順治刻本者，<sup>9</sup> 其書或有可疑，或尚無確據，均不敢質定。

清雍正年間之刻本，亦可見此類紙廠印記，如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所藏清戴鉉撰《四書講義尊聞錄》，清雍正六年（1728）懷新堂刻本，<sup>10</sup> 其書扉頁題「雍正戊申歲鐫」，書中卷六，頁 29，a 面，鈐有「嵩益字號」朱文橢圓印，又卷二十，頁 73，b 面，鈐有紅、藍色圖案之紙廠印記，即其例也。

紙廠印記最常見於清乾隆間之刻本或抄本中。如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所藏清劉維謙撰《詩經叶音辨譌》八卷，清乾隆三年（1738）壽峯書屋刻本、<sup>11</sup> 清沈青崖撰《毛詩明辨錄》十卷，清乾隆十三年（1748）毛德基刻本、<sup>12</sup> 清秦蕙田（1702-1764）撰《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清乾隆十八年（1753）味經窩刻本<sup>13</sup> 等書，書中皆見鈐有長條形紅、藍色圖案之紙廠印記。又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宋楊仲良撰《皇朝通鑑長編記事本末》存一百四十二卷，清乾隆四十年（1775）至四十一年（1776）王氏抄本，<sup>14</sup> 書中見鈐有「吳正昌號」朱文長方印記及長條形含有「吳」字片段之紅、藍色圖案印記，皆其例也。

---

<sup>6</sup> 登錄號：0103464-529。

<sup>7</sup> 馬維駒、馬秋湄之生平待考。

<sup>8</sup> 如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所藏，舊題宋朱熹撰，明徐方廣增註，清陳元燮輯訂，《朱子四書或問小註》一書（索書號：T885 2900），其扉頁題「康熙壬午年鐫」，書中《朱子論語或問小註》卷 3，頁 20，a 面，見鈐有長條形藍色圖案之紙廠印記，即是一例。

<sup>9</sup> 部分例子，辨見下文所論。

<sup>10</sup> 索書號：T856 4583。

<sup>11</sup> 索書號：T470 7220。

<sup>12</sup> 索書號：T435 3152。

<sup>13</sup> 索書號：T648 5946。

<sup>14</sup> 索書號：230.251 02004。

紙廠印記出現於清代中文古籍，其時間下限亦未能確定，惟今存世清代嘉慶、道光間之抄本仍可見此類印記，刻本中則較罕見。如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元夏文彥撰《青樓集》一卷，清嘉慶十四年（1809）丁竹浯抄本、<sup>15</sup> 宋王象之撰《輿地紀勝》存一百六十卷，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揚州岑氏懼盈齋綠格抄本<sup>16</sup> 等書，書中皆鈐有「仁豐字號」朱文長方印記，知嘉、道間所用抄書紙張仍出現鈐有紙廠印記之跡。

紙廠印記出現於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之時間上限與下限雖尚難確定，然整體而言，其曾出現於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之古籍中，則無可疑，其中又以乾隆間最為常見。又此紙廠印記每與「荊川太史紙」有關，亦值得注意。

### 三、紙廠印記在清代中文善本古籍版本鑑定之運用舉隅

李致忠（2003）於《古書版本學概論》中嘗云：「當然，紙張並不能對古書版本鑒定起決定的作用，因為後世用前世紙寫書、印書都是可能的。但在大的時代上總還可以幫助人們劃定界限。知道了這些，於版本鑒定顯然是有用的。」李先生所言極是，紙張只能作為版本鑒定之輔助項目，無法單獨起決定性之作用。然若某一時代之刻本或稿、抄本中，其紙張常出現某些外加之特徵（如本文所論之紙廠鈐印），且非單一、偶然現象，則此紙張特徵對古籍版本鑒定，當具有較高之利用價值。以下試就幾方面，各舉二例以論之。

#### （一）利用紙廠印記，可輔助判斷版本著錄之訛誤

今傳世古籍中，有頗多館藏目錄著錄為明代刻本，而書中見鈐有上述之紙廠印記者，可據他證再佐以紙廠印記之特徵，以判斷其著錄之訛誤，「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鈐紙廠印記研究」中已嘗舉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明錢一本撰《像抄》一書為例（張寶三，2012），今復舉二例以論之。

1. 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有明張岐然（1600-1664）輯《春秋四家五傳平文》四十一卷首一卷，附明虞宗瑤輯《春秋提要》二卷一部，<sup>17</sup> 此書《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為「明崇禎十四年君山堂刻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

<sup>15</sup> 索書號：205.1 02405。

<sup>16</sup> 索書號：210.1 03188。

<sup>17</sup> 索書號：T695 1322。

1989, 頁 282), 並載北京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等八館有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嘗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本影印行世, 題「明崇禎十四年君山堂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1997)。今比對芝加哥大學藏本與清華大學藏本, 當為同版。考芝加哥大學藏本扉頁左下鈐有「君山/堂臧/書記」朱文大方印, 又書首吳漢翹「序」中云:「但事多駁古, 不敢苟發, 遂與余共業南屏, 訂定此本, 以先天下, 題曰:《平文》, 亦欲使學者每讀一經, 即朗然見五傳之全異。……故始於庚辰孟夏, 卒於辛巳仲秋, 閱月十六而《平文》之書以成, 用公世之習讀是經者, 肆志其中, 以窺古人之全。」據張岐然之生平以推之, 庚辰為明崇禎十三年(1640),<sup>18</sup> 辛巳為崇禎十四年(1641),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及諸家書目題為「明崇禎十四年君山堂刻本」者, 蓋據扉頁及吳漢翹此「序」也。然今考芝加哥大學所藏本, 此書卷首及卷一之卷端皆題「明仁和張岐然秀初手輯、錢塘吳漢翹舉遠參閱」, 若其書刊刻於明代, 如無特殊原因, 其作者實不需題「明」, 今此本卷首及卷一之卷端題「明」, 似不能無疑。又書中卷六, 頁 27, a 面、卷十七, 頁 36, a 面、卷三十五, 頁 40, a 面等處皆見鈐有長條形紅、藍色圖案之紙廠印記, (如圖 4) 此為清代康、雍、乾刻本用紙之特徵, 然則此書非明崇禎十四年(1641)刻本, 蓋可斷也。

2.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增訂善本書目》「叢部·類編·經部」共著錄四部《十三經註疏》毛氏汲古閣刻本。其首部著錄云:「《十三經註疏》三百三十三卷, 六十六冊。明崇禎元年(1628)至十二年(1639)古虞毛氏汲古閣刊本」(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編輯, 2011, 頁 676)。其餘三部皆著錄云:「版刻、行款同前」(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編輯, 2011), 以為皆是同版。今考其中第三部《十三經註疏》, 索書號 0270406-561, 330 卷, 156 冊, 書中鈐有「久保天隨/珍藏圖書」朱文長方印、「柱園/藏書」朱文方印等藏書印, 乃日治時期故臺北帝國大學東洋文學科久保天隨(1875-1934)教授之舊藏(周延燕編, 2012)。此書雖各經皆鑄有

---

<sup>18</sup> 清黃宗羲(1610-1695)撰〈張仁菴先生墓誌銘〉云:「君諱岐然, 字秀初, 叢林稱為仁菴禪師。……國變後, 寄迹僧齋。後四年己丑, 抽簪落髮。又三年壬辰, 始受衣拂, 出世於皋亭山之顯寧。……甲辰七月三日, 卒於慶雲, 年六十五。」見《南雷詩文集》, 《黃宗羲全集》(杭州市: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第 10 冊, 頁 456-457。據此知張岐然卒於清康熙三年(甲辰, 1664), 黃宗羲言其「年六十五」, 則蓋生於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計張岐然一生所逢庚辰年, 必在明崇禎十三年(1640)也。

毛氏汲古閣之刊記，版心下方亦皆鐫「汲古閣」三字，然《周易兼義·上經·需傳》卷第二卷端、《毛詩註疏》卷第十二卷端、《儀禮註疏》·〈儀禮註疏序〉卷端、《春秋左傳註疏》卷第十五卷端、《論語註疏解經》·〈論語註疏解經序〉卷端等處上方天頭皆鐫有「莊內邸／總計部」墨文方印。又《禮記註疏》卷二十一，頁 15 有殘闕現象，其中「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至「皆從其朔」一節之疏文，此本「冬則居營窟」作「冬則居橧巢」，汲古閣刻本他本則作「冬則居營窟」。<sup>19</sup> 又《爾雅註疏》書末之刊記謹存右列一行，且字跡模糊。據此等現象，則謂此本為毛氏汲古閣明代刻本，甚可疑也。今又考此本《毛詩註疏》卷第二十之 3，頁 16，b 面，鈐有「福建／安隆盛號本／廠督造潔白／荊川毛八太／史紙貨發行」朱文長方印記（如圖 5），此為清代康、雍、乾時期刻本之紙張特徵，輔以此佐證，則此本非明代崇禎刻本，當可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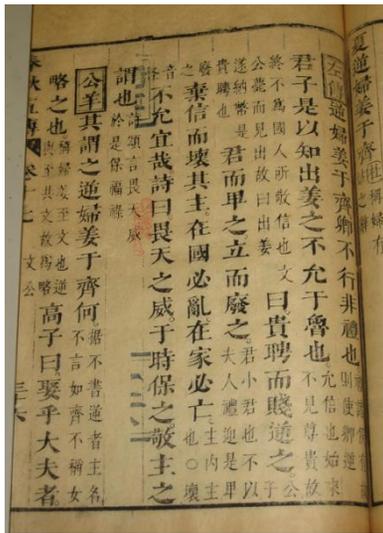


圖 4 《春秋四家五傳平文》中之紙廠印記。圖片取自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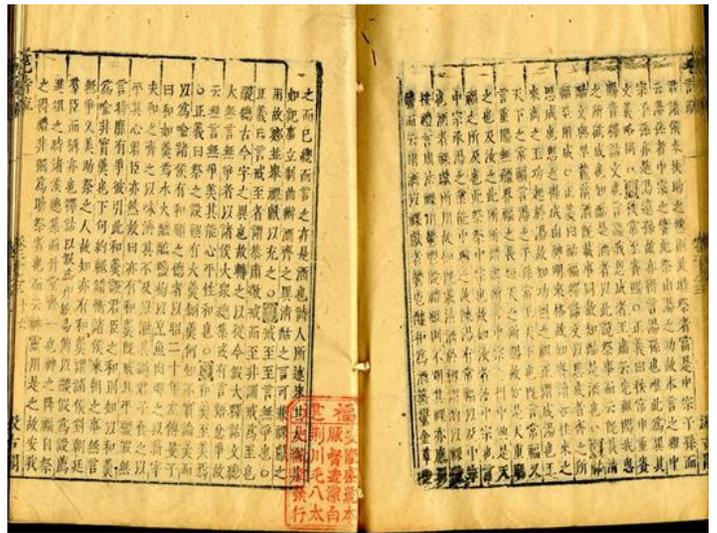


圖 5 福建／安隆盛號本／廠督造潔白／荊川毛八太／史紙貨發行。圖片取自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汲古閣刻本《十三經註疏》。

<sup>19</sup> 清阮元刻本《禮記注疏》（臺北市：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刻本，1955），卷 21，頁 11，亦作「冬則居營窟，夏作居橧巢」，當以作「冬則居營窟」為是。

## (二) 利用紙廠印記，可輔助推考版本之時代斷限

在考訂版本時代之際，若有疑點，紙廠印記可作為推斷之輔助。另若其書之版刻時代與印刷時代不一致時，亦可據紙廠印記作為佐證，加以推考。舉例如下：

1. 《中國古籍總目·經部·春秋類·傳說之屬》著錄「《左傳經世鈔》九卷，清魏禧評點，清康熙間刻本」一種，載北京國家圖書館收藏（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2012，頁 584）。另又著錄「《左傳經世鈔》二十三卷，清魏禧評點，清彭家屏參訂，清乾隆十三年彭家屏聯墨齋刻本。」一種，載北京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等六館收藏（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2012，頁 584）。今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有《左傳經世鈔》二十三卷本二種。<sup>20</sup> 其中第一種，二十三卷，十二冊。每半頁九行，行二十一字，寫刻體。卷端題「寧都魏禧冰叔評點／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書首有彭家屏「左傳經世鈔序」，未署「乾隆十三歲在戊辰七月望後，夏邑彭家屏樂君書於西江官署之石翠山房。」扉頁中題「左傳經世鈔」，右上題「寧都魏叔子評點／夏邑彭樂君參訂」，左下題「本衙藏板」。（如圖 6）另一種亦二十三卷，十六冊，每半頁八行，行二十一字，匠體。卷端所題及書首彭家屏「敘」皆同九行本。扉頁中題「左傳經世鈔」，右上空白，左下題「聯墨堂藏板」。（如圖 7）今以行款、字體、扉頁等觀之，此兩種刻本當係不同版本無疑。韓兆海與張穎主編（2004）之《武漢圖書館館藏古籍善本書志（第一輯）》著錄「《左傳經世鈔》二十三卷」一書，題「清魏禧評點，清彭家屏參訂，清乾隆十三年（1748）夏邑彭家屏江西刻本。半葉九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同。」書志中曾對「本衙藏板」與「聯墨堂藏板」之異同，有所疑問。<sup>21</sup> 今若輔以紙廠印記，當可解此兩種版本時代之疑。考「本衙藏板」九行本，書首〈凡例〉頁 2，a 面及卷十三，頁 37，a 面皆鈐有長條形紅、藍色圖案之紙廠印記，據彭家屏「左傳經世鈔敘」云：「因舊刻僅九卷，且日久漸就

<sup>20</sup> 登錄號分別為 011102-13；0080913-28。另有殘本一種，存八冊，版刻同第一種，從略不論。

<sup>21</sup> 如書志中云：「臺灣東海大學圖書館亦藏『清乾隆間聯墨堂藏版』，著錄曰：『（略）』。與館藏本大體相似，惟行款稍異，別是一本歟？然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聯墨堂刊本，著錄又作九行二十一字，與館藏本同，惟板心『花口』。臆八行、花口，皆是著錄之訛謬，各家所藏，應出同版。若『本衙藏版』與『聯墨堂藏版』者，或是書板易手、印本先後之留痕。」（韓兆海、張穎主編，2004，頁 176）案：此書志編者因未睹臺大圖書館所藏《左傳經世鈔》二本原書，故有此疑，辨見下文。

漫漶，於其從孫澐得全本，重為剞劂，成完璧焉。」未署「乾隆十三年歲在戊辰七月望後」，則此彭家屏重校本乃刻於乾隆十三年（1748），與書中出現紙廠印記之特徵正相符合，可信為乾隆刻本。反之，「聯墨堂藏板」，其行款為八行，匠體字，內容雖與九行本同，然時見闕字及誤字。以彭家屏「左傳經世鈔敘」為例，「聯墨堂藏板」頁1，a面第四行闕「而作」二字，b面第三行闕「知」字，第九行「當」字誤刻為「畜」字，第二頁，a面第二行闕「此」字，第五行「凡」字誤刻為「九」字，此蓋據九行本重刻時所衍生之闕、誤也。然則「本衙藏板」之九行本既可據紙廠印記斷為乾隆十三年（1748）刻本，而「聯墨堂藏板」之八行本，其據九行本而重刻，非乾隆十三年刻本，亦可斷言。《中國古籍總目》著錄「清乾隆十三年彭家屏聯墨齋刻本」（頁584），當有誤。



圖6 《左傳經世鈔》本衙藏板，扉頁。圖片取自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圖7 《左傳經世鈔》聯墨堂藏板，扉頁。圖片取自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2. 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有清姜兆錫（1666-1745）撰《九經補註》一部，八十七卷。<sup>22</sup> 線上目錄（<http://catalog.lib.uchicago.edu/>）題：「Imprint：[ china ]：寅清樓，清雍正元年—乾隆五年〔1723-1740〕。」《中國古籍總目》著錄「《九經

<sup>22</sup> 索書號：T110 8438。

補注》八十三卷，清姜兆錫撰，清雍正乾隆間寅清樓刻本。」一種，載北京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四館收藏（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2012，頁24）。考芝加哥大學所藏此書共包括姜兆錫所撰八種著作，其書名及刊刻年代如下：《周禮輯義》十二卷、清雍正九年（1731）刻；《儀禮經傳》內編二十三卷，外編五卷，首一卷，清乾隆元年（1723）刻；《禮記章義》十卷，清雍正十年（1732）刻；《春秋公羊穀梁諸傳彙義》十二卷，清乾隆五年（1740）刻；《春秋胡傳參義》十二卷，附《孝經本義》一卷，清雍正元年（1723）刻；《書經蔡傳參義》六卷，清雍正十二年（1734）刻；《爾雅註疏參義》六卷，清雍正十年（1732）刻。各書之刊刻年代乃據扉頁所題而推定。然細考此書所含著作，其中《周禮輯義》、《儀禮經傳》、《禮記章義》、《春秋公羊穀梁諸傳彙義》、《春秋胡傳參義》、《爾雅註疏參義》等六書皆見鈐有紙廠印記，且印記之特徵有其一致性，蓋採用同一來源之紙張所印刷。<sup>23</sup>由此推之，姜兆錫此《九經補註》所含各著作，刊刻年代雖歷雍正元年（1723）至乾隆五年（1740），然蓋係於乾隆五年（1740）《春秋公羊穀梁諸傳彙義》刻成後，彙集諸書，合為《九經補註》，一齊印刷，故其書中乃出現同一特徵之紙廠印記也。由此一例，可見部分古籍版刻時代與印刷時代未必一致，可據紙廠印記作為佐證，以推斷其印本之大約年代。

### （三）利用紙廠印記，可佐證版本鑑定之準確性

紙廠印記作為一種特徵，有時可用以佐證所鑑定版本之準確性，舉例如下：

1. 芝加哥大學藏有清吳炳文摘錄《春秋左傳彙輯》四十卷一部，<sup>24</sup>訂為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南麓軒藏本。然此書無扉頁，尚需佐以他證。考臺灣大學藏有同書同版一部，<sup>25</sup>其本首有扉頁，中題「春秋左傳彙輯」，右上題「乾隆癸卯夏日」，左下題「南麓軒藏板」。又芝加哥大學藏本與臺灣大學藏本皆見鈐有「吳正裕號」朱文長方印記及長條形含有「本」字或「廠」字之紅、藍色圖案印記

---

<sup>23</sup> 如《儀禮經傳內編》卷17，頁3，a面及《爾雅註疏參義》卷5，頁19，a面，皆見鈐有長條形紅、藍色圖案之紙廠印記，藍色圖案中含有「號」字之上半部，兩者圖案極為相似。另《爾雅註釋參義》卷5，頁19，b面見鈐有「邱廣達號」朱文長方紙廠印記，以此推之，此紙貨蓋由「邱廣達號」所生產。

<sup>24</sup> 索書號：T718 2390。

<sup>25</sup> 索書號：0080868-91。

等紙廠印記，其紙張特徵相同，益可證兩本當為同時期之同版印本。由此可佐證芝加哥大學藏本訂為乾隆四十八年（1783）南麓軒藏本，確可信也。

2. 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有清胡文英撰《詩經逢原》十卷一部，<sup>26</sup> 其書無扉頁，書首有胡文英「序」，末署「乾隆五十一年歲次丙午十月上浣武進胡文英繩崖氏識」，線上目錄(<http://catalog.lib.uchicago.edu/>)題云：「Imprint : [ china : s.n. ] : 清乾隆 [ between 1786 and 1795 ]」。另《中國古籍總目》亦著錄「《詩經逢原》十卷，清胡文英撰，清乾隆年間刻本。」載北京國家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等四館收藏（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2012，頁 361）。今考芝加哥大學此本卷六，頁 31，a 面鈐有朱文長方印記，b 面鈐有長條形紅、藍色圖案印記（如圖 8），此類印記屢見於清乾隆間之刻本，此書訂為清乾隆刻本，與此特徵相符，應可從也。



圖 8 《詩經逢原》中之紙廠印記。圖片取自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藏。

#### （四）紙廠印記運用於清代中文善本古籍版本鑑定之限制及省思

紙廠印記運用於清代中文善本古籍版本鑑定，目前僅是開端，尚存在許多疑點有待釐清。因此運用紙廠印記於清代善本古籍版本鑑定，仍應知其限制，以免陷於誤判。舉例而言，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有《朱兆熊遺書》二十五卷一部，清朱兆熊撰。

<sup>26</sup> 索書號：T435 4204。

<sup>27</sup> 此書無扉頁，無法據扉頁以斷其刊刻年代。其書首有手抄「朱兆熊遺書總目」一頁，有行格，每半頁九行，左右雙邊，白口，單魚尾。版心上題「朱兆熊遺書」，中題「總目」。此頁「總目」a 面列「周易後傳八卷」、「易互卦圖一卷」、「春秋新義十二卷」、「春秋表三種」、「星新經一卷」諸書名。b 面見鈐有長條形藍色圖案之紙廠印記。此類紙廠印記常見於乾隆間刻本，朱兆熊又為乾隆時人，據此似初步可推測此書約為乾隆間刻本。然今考《遺書》中第一種為《周易後傳》，此書首有沈元熙跋（未立標題，版心鐫『跋』），跋文中云：「《周易後傳》八卷，《冬夜講義錄》一卷，《互卦圖》一卷，共十卷，朱丈茲泉所著。其言理也，以象顯之；其言象也，以理索之，宜於《易》無微不抉，俾讀者快然有以自得。歲次著雍執徐，先以《後傳》付刊，屬熙校讎。……工既竣，爰附數言於末。同邑沈元熙敬跋。」此跋云：「歲次著雍執徐，先以《後傳》付刊。」則《周易後傳》之刊刻年代可據此推考。案：《爾雅·釋天》云：「大歲在甲曰闕逢，……在戊曰著雍」（晉郭璞注，1955，卷6，頁6）。又云：「大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闕，在辰曰執徐」（晉郭璞注，1955，卷6，頁6）。然則《周易後傳》乃刊於戊辰之年。考朱兆熊，號茲泉，海寧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舉人，官龍游訓導（嘉興古代名人〔資料庫〕）。以此推之，此戊辰年當係清嘉慶十三年（1808）年也。<sup>28</sup> 朱氏《遺書》中既以《周易後傳》為最先付梓，則他書之刻當更晚於此年。又考此書書首「朱兆熊遺書總目」一頁為手抄，手抄而用舊紙亦極為可能，故傳世清代嘉慶、道光間之抄本亦嘗見有紙廠印記也（夏文彥，1809；王象之，1848）。然則此《朱兆熊遺書》，不可因其書首「總目」一頁嘗出現紙廠印記，即遽斷此書刻於乾隆年間也。由此一例，可知將紙廠印記運用於版本鑑定，主要仍居佐證地位，尚須依賴其他積極證據，不宜過度誇大其功能。

雖然如此，仍不能低估紙廠印記在清代中文善本古籍版本鑑定上所具之價值，如上文所論，臺灣大學圖書館所存久保天隨舊藏汲古閣本《十三經註疏》，《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增訂善本書目》雖著錄為「明崇禎元年（1628）至十二年（1639）古虞毛氏汲古閣刊本」，然因其書中鈐有紙廠印記，訂為明刻本，實有可疑，經詳考，知當為清代重刊本。依此推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十三經註疏》三百三十三卷，

<sup>27</sup> 索書號：T110 2932。

<sup>28</sup> 孫殿起，《販書偶記》（京都市：中文出版社，1979）卷1，〈經部·易類〉曾著錄「《周易後傳》八卷《冬夜講易錄》一卷《易互卦圖》一卷，鹽官朱兆熊撰，無刻書年月，約嘉慶間刊。」（頁5）孫氏所推《周易後傳》等書刊刻之年代，與沈文熙跋文所言大致符合。

明崇禎元年至十二年毛氏汲古閣刻本」一種，載共有首都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等 37 館收藏（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1989，頁 11）。此 37 館所藏汲古閣刻本，是否果皆為明崇禎刻本，恐不能無疑。《中國古籍總目》著錄「《十三經注疏》三百三十三卷，明□□輯，明崇禎元年至十二年古虞毛氏汲古閣刻本」一種，載首都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天津圖書館、南開大學圖書館、遼寧大學圖書館等八館收藏（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2012，頁 9），於館藏數量似有所修正。今若以紙廠印記之有、無為標準，檢閱上述 37 館所藏汲古閣刻本，則何者非明代刻本，似可初步判別也。

此外，今版本著錄每重視刊刻年代，於印刷時間則較易忽略，不能無憾。如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有「《春秋衡庫》三十卷《附錄》三卷《備錄》一卷」一部，明馮夢龍（1574-1646）撰，明張我城參，<sup>29</sup> 線上目錄（<http://catalog.lib.uchicago.edu/>）題：「Imprint：〔蘇州：葉昆池能遠居，明天啟 5 年（1625）。〕」《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春秋衡庫》三十卷《附錄》三卷《備錄》一卷，明馮夢龍撰，明天啟五年刻本。」一種，載首都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等 21 館收藏（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1989，頁 281）。此書《四庫全書》入存目，《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本影印出版，題「明天啟五年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1997）。今考芝加哥大學藏本與北京大學藏本，書中皆出現鈐有紙廠印記之特徵，當皆為清初印本，其是否為明天啟五年刻本（1625）之原刻，雖不能遽定，然印刷時代已入清，蓋可知也。紙廠印記有助於對版本之印刷時間作更具體之掌握，實不容忽視。

## 五、結論

紙廠印記運用於清代中文善本古籍版本鑑定，目前僅是開端，尚處於嘗試之階段，目前仍有極多疑點有待釐清，有更多資料有待搜集與探索。本文在前文「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鈐紙廠印記研究」基礎上，針對紙廠印記在清代中文善本古籍版本鑑

---

<sup>29</sup> 索書號：T693 3240。

定之運用及其相關問題續作探討，文中指出：(一)利用紙廠印記，可輔助判斷版本著錄之訛誤；(二)利用紙廠印記，可輔助推考版本之時代斷限；(三)利用紙廠印記，可佐證版本鑑定之準確性。歸結而言，紙廠印記有助於清代中文善本古籍版本之鑑定，當可斷言。惟運用紙廠印記於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之鑑定，僅能居於輔助之地位，有其限制，需知其限制，審慎為之，方不致誤判。

以往之版本著錄，較重視版刻時代，對於刷印時間，較易忽略，未能無憾。今若適度利用紙廠印記此一紙張特徵，當可稍補此一遺憾。又近年來，海內外各圖書館陸續有中文善本書志之撰作與出版。今後撰寫中文善本書志，若能將各書中出現之紙廠印記詳加紀錄，不但可使所著錄之古籍版本特徵更為明顯，且可增益紙廠印記之研究資料，使對紙廠印記之了解更加清晰，則紙廠印記必可發揮更大之利用價值。

**附記：**近年來，刻從事《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經部善本書志》、《臺灣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經部善本書志》之撰作，遇有紙廠印記，隨筆輒錄，所積漸夥，故本文舉例，引二館所藏為多。另又蒙國家圖書館特藏組惠允調閱珍藏圖書，得以充實資料。在此謹對三館併致謝忱。惟聞見未廣，仍恐不免一隅之觀，尚祈博雅方家有以教之。本文改寫自拙作「紙廠印記在清代中文善本古籍版本鑑定之運用」刊登於《鑑藏：兩岸古籍整理與維護研討會論文集》(2015年8月)，67-78頁。

## 參考文獻

### (傳統文獻)

- 魏·王弼等註(1628-1639)。《十三經註疏 三百三十三卷》(題「明崇禎元年至十二年毛氏汲古閣刊本」)。(臺灣大學圖書館藏，以下簡稱「臺大藏」)
-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1955)。《爾雅注疏 十卷》(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刻本)。臺北市：藝文印書館。
- 宋·楊仲良(1775-1776)。《皇朝通鑑紀事本末 存一百四十二卷》(清乾隆四十年至四十一年王氏抄本)。(國家圖書館藏，以下簡稱「國圖藏」)
- 宋·王象之撰(1848)。《輿地紀勝 存一百六十卷》(清道光二十八年楊州岑氏懼盈齋綠格抄本)。(國圖藏)

- 元·夏元彥（1809）。*青樓集* 一卷（清嘉慶十四年丁竹浯抄本）。（國圖藏）
- 明·張岐然（1641）。*春秋四家五傳平文* 四十一卷首一卷，附明虞宗瑤輯*春秋提要*八卷（題「明崇禎十四年（1641）君山堂刻本」）。（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藏，以下簡稱「芝加哥大學藏」）
- 明·張岐然（1997）。*春秋四家五傳平文* 四十一卷首一卷附八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128冊，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四年君山堂刻本影印）。濟南市：齊魯書社出版社。
- 明·馮夢龍（1997）。*春秋衡庫* 三十卷 附錄 三卷 備錄 一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123冊，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啟五年刻本影印）。濟南市：齊魯書社出版社。
- 明·錢一本（1613）。*像抄* 六卷（題「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蘭雪堂刊本」）（臺大藏）
- 清·朱兆熊（1796-1820）。*朱兆熊遺書* 二十五卷（清嘉慶間刻本）。（芝加哥大學藏）
- 清·吳炳文（1783）。*春秋左傳彙輯* 四十卷（清乾隆四十八年南麓軒藏本）。（芝加哥大學、臺大藏）
- 清·沈青崖（1748）。*毛詩明辨錄* 十卷（清乾隆十三年毛德基刻本）。（芝加哥大學藏）
- 清·姜兆錫（1723-1740）。*九經補註* 八十七卷（題清雍正元年—乾隆五年刻本）。（芝加哥大學藏）
- 清·胡文英（1736-1795）。*詩經逢原* 十卷（清乾隆間刻本）。（芝加哥大學藏）
- 清·秦蕙田（1753）。*五禮通考* 二百六十二卷（清乾隆十八年味經窩刻本）。（芝加哥大學藏）
- 清·納蘭成德輯（1680）。*通志堂經解* 存一百三十六種（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本）。（臺大藏）
- 清·黃宗羲著、沈善洪主編（2005）。*黃宗羲全集*（增訂版，點校本）。杭州市：浙江古籍出版社。
- 清·劉維謙（1738）。*詩經叶音辨譌*八卷（清乾隆三年壽峯書屋刻本）。（芝加哥大學藏）
- 清·戴鉉（1728）。*四書講義尊聞錄* 二十卷（清雍正六年懷新堂刻本）。（芝加哥大學藏）
- 清·魏禧評點、清·彭家屏參訂（1748）。*左傳經世鈔* 二十三卷（題「清乾隆十三年聯墨堂刊本。」）（臺大藏）
- 清·魏禧評點，清·彭家屏參訂。*左傳經世鈔* 二十三卷（題「板刻、行款同前，但字體不同。」）（臺大藏）

### （近人論著）

-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1989）。*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2012）。*中國古籍總目·經部*。北京市：中華書局。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1997)。《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濟南市：齊魯書社出版社。
- 任曉輝 (2013)。俄羅斯聖彼得堡藏抄本《石頭記》目驗記。《曹雪芹研究》，2，1-10。
- 李致忠 (2003)。《古書版本學概論》。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沈津主編 (2011)。《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史部》。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周延燕編 (2012)。《臺灣大學圖書館館藏久保文庫漢籍分類目錄》。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 孫殿起 (1979)。《販書偶記》。京都市：中文出版社。
-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編輯、周駿富審訂 (2011)。《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增訂善本書目》。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 國家圖書館編印 (1996)。《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經部》。臺北市：國家圖書館。
- 張寶三 (2012)。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鈐紙廠印記研究。《臺大中文學報》，39，213-246。
- 張寶三 (2012.5)。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鈐紙廠印記研究。「文本中國：現代中國以前文本資料之構成、傳遞與保存」國際學術研討會。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學系、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合辦，芝加哥。
- 嘉興古代名人〔數據庫〕。嘉興市：嘉興市圖書館。檢自  
[http://gxgc.zjlib.cn:8081/pub/jiax\\_grw/](http://gxgc.zjlib.cn:8081/pub/jiax_grw/)
- 韓兆海、張穎主編 (2004)。《武漢圖書館館藏古籍善本書志 (第一輯)》。武漢市：湖北人民出版社。